学术专论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大学预科研究*
——以“五校特约”为中心

严　平

〔摘要〕 有别于既往革命史视角下，在私立学校接受“速成教育”的留日学生研究，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为位于国民教育体系顶端的帝国大学及其预科（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本文通过挖掘新史料，首先还原清末留学生最初进入大学预科时的情形，然后考察“五校特约”协议的实施过程，重点围绕留学生的教学方式以及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分析中日双方在留学生教育问题上的各自意图和矛盾，最终勾勒出清末直至 1932 年以前日本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的整体轮廓与特点。

〔关键词〕 中国留学生　帝国大学　高等学校　精英教育　近代日本
〔中图分类号〕 K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2）-04-0053-10

A Study on the Chinese Student Elites in Imperial Japan

Past research on Chinese students in modern Japan were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have taken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received “instant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s the subject.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studying in Japan were intended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aking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as the apex, to receive both top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 education. Digging through som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ese Colleges and preparatory schools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modern Japan; identifi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licies of studying abroad among Chinese government,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and diplomacy; and in conclusion, demonstrates the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from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aspect.

近代中国的日本留学，从历史时期来看，始于甲午战后，于二十世纪初达到第一个高潮①。清末的留日学生，虽人数众多②，但从接受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留日学生接受的多为军事、政法、师范等“速成教育”；二是教育机构以同文书院等专为中国学生开设的私立学校为主。依照当时日本的教育制度，这类学校均属“各类学校”。即位列国民教育体系之外，不受文部省管理、保护的学校③。上述特征，说明当时中国留学生接受的，多为非正规教育机构提供的“速成教育”。

这个事实，显然与中国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初衷背道而驰。众所周知，清政府之所以派遣留日，最大的目的在于取道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因此，中国派遣留日的侧重点，在于促成留学生在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正规的高等、专业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

〔收稿日期〕 2012-04-20
〔作者简介〕 严平（1971—），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本的国民教育体系大体分为“正系”和“旁系”两个系统。正系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位于顶端的是帝国大学和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往下为中学校和小学校。而旁系由高等师范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构成。由于两个系统互不交叉，因此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的升学路径，被称为战前日本的“精英教育路径”。中国政府派遣学生留日，其目的显然是进入日本的精英教育机构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从日方来看，其招收留学生的推动力来自外交部门，而非教育部门④。换言之，日本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动机，首先在于政治、外交需要，而教育部门则是应外交部门的要求，被动地采取具体的实施措施而已。因此，在留学生教育的具体实施细节问题上，中日双方的各自意图和矛盾便显露出来。为反思既往的“私立”、“速成”教育，对留日教育重新定位，中日两国政府于 1907 年签订了“五校特约”。该协议的签订，从制度上开启了中国留学生进入第一高等学校，步入帝国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大门。

近年来，伴随着日本各大学文书馆（档案馆）的成立以及大学史研究随之取得的长足进展，帝国大学及其预科的中国留学生也逐渐为世人所知⑤。即便如此，与既往众多的革命史、外交史视角下的留学研究相比而言，针对精英教育机构留日学生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例如，在官派留学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东京帝国大学，以及留学生为数众多的京都帝国大学，其留学生的具体情况尚未完全把握⑥。正如永田英明强调的那样，除去抗战这一特殊时期，考入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来自于高等学校。换句话说，位于日本国民教育体系金字塔顶端的高等学校—帝国大学这一“精英教育”生产装置，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留学生。因此，把握大学预科留学生的教育状况，对于剖析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的本质与特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针对上述课题，本文拟首先运用东京大学博物馆及京都大学档案馆所藏文献，还原中国留学生最初进入大学预科时的情形。然后通过分析台湾国史馆所藏清末学部资料，考察“五校特约”协议的实施过程，重点围绕留学生的教学方式以及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剖析文部省以及各高等教育机构在留学生教育问题上与中国政府以及留学生的矛盾和博弈过程，最终勾勒出清末民初直至 1932 年以前日本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的整体轮廓与特点。

一、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日本留学始于 1896 年⑦，当时的留学生多在喜纳治五郎开设的私塾以及后来的亦乐书院（1899 年开办，1902 年改称“弘（宏）文书院”），或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私立教育机构，集中地接受军事、政法、师范等“速成”教育。由于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及财政支出均偏向国立、公立学校，导致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相对较弱，并且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困境。因此，相对于国立、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在招收留学生方面显得更为积极。同时，由于私立学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某些专门以招收中国留学生以获取利益的教育机构，以至于被讽为“学商”、“学店”而招来社会的批判。

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最早的中国留学生，见于 1899 年浙江省派遣的“官费生”。“清国人钱承鋕以下六名”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略称“一高”）学习，这在日本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尚属首次⑧。作为大学预科的高等学校几乎是进入帝国大学学习的唯一途径，因此第一高等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出现，在近代留日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部省有关直属学校招收外国学生的规定于 1900 年颁布，故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规定中并无涉及留学生的内容，校方为此专门制定了附加规则予以应对。据此，由于留学生“欠缺入学规则之要件”，即“中学校第四年修了或是具有同等学力者”，因此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为“旁听生”。“旁听”期满后，只可取得相应课程的履修证明，不能像正规生那样获得毕业证书⑨。此规定，即意味着留学生“毕业”后无法与日本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一样，获得直接升入帝国大学的资格。

具体来说，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在第一高等

学校的待遇如何呢？对此，校方在 1900 年 3 月照会文部省，特做如下说明：

> 一　入学资格及手续　该八名受外务省委托入学，未实施入学考试。故入学当时之学力资格难以评定。唯其保证人受外务省委托，由中国留学生监督日华学堂总监担任。
>
> 一　入学金　学费及图书借用费概不征收。
>
> 一　入住寄宿寮者当特别对待。
>
> （一）入寮生概不征收寄宿费。
>
> （二）入寮生当得寄宿寮委员特别看护。清国学生入寮虽依本人意愿，但因其情况与其本国情境全然不同，尤其是寮内生活需特别看护、引导方可。
>
> （三）入寮生时间外特授之以体操。体操乃本人等所切望，虽为当校体育上之必要课程，尤本人不具备与本校一般学生相同之素养，体操教员当于时间外特授之以兵式体操初步[10]。

从上述照会中，我们能够对当时一高中国留学生的在学身份、收费、生活等情况略知一二。首先，他们的身份为外务省委托生，校方对他们采取了免试入学，不征收学费、寄宿费等特殊政策。同时，针对寄宿生校方还会通过强化体操教育等形式以加强其"素养"[11]。虽说寄宿与否"依本人意愿"，但是由于一高向来标榜"皆寄宿制"[12]，因此留学生尚未抵达，校方就预留了足够的铺位供其留宿[13]。当时，校方为留学生提供的旁听课程，主要有德语、英语、代数、三角法、图画（或政治地理）、体操等[14]。

如前所述，高等学校首批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是在外务省推动、文部省所辖国立学校协助下实现的。虽然文部省于 1900 年 7 月 4 日发布《关于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的规程》（省令第 11 号），翌年 11 月 11 日又以省令 15 号的形式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入学特别规程》（下文中略称为《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15]，但是实际上各教育机构主动接纳留学生的例子并不多见。例如一高，迎来第二批留学生是在 1904 年 1 月，距离第一批招生已相隔数年。当时，北京京师大学堂选拔了 31 人去日本留学，由外务、文部两省协商后全部送往一高学习。1905 年 8 月，经过双方协商，其中 6 人作为"选科生"准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选科生"为未经高等学校毕业即进入帝国大学的特例，此举可谓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接受帝国大学教育的先河。

在此之前，第三高等学校（以下略称"三高"）也于 1903 年 9 月迎来了首批中国留学生[16]。三高留学，据说是在时任两广总督学务顾问藤田剑峰的斡旋下得以实现的（《狱水会杂志》第 30 号）。当时的留学生招收办法，即依据前文所述《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17]。1903 年以后的招收人数虽然不多，但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入学：1904 年一人、1905 年 2 月三人、同年 9 月三人等。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留日学生数量剧增。面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热潮，文部省专门发文调查其直属高等学校的招生余力情况，同时要求各校汇报由此产生的教职员编制增加、教室增设情况以及相关预算等问题[18]。对此，三高于 5 月 9 日做答如下：

> 当校向来狭小，恐无可供用之余地。若当校招收六十名并提供寄宿，分成两班教学，所需校舍增建、器具等设备及常规费用等请参见附件。特此回报。
>
> （附件）清国留学生教育费
>
> 俸给　三千六百円（教授三人年俸各一千二百円）
>
> 办公费　八百五十円（图书、机械、器具等用品费用，纸薪碳类杂品、寄宿舍电灯费等消耗品费及通信费）
>
> 杂费　二百五十円（详目省略——笔者注）
>
> 常规费合计　四千七百円
>
> 设备费合计　六百円
>
> 总计　五千三百円[19]

从上述回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三高接收中国留学生计划的概要。首先，位于京都二本松的三高由于面积狭小，为了招收更多留学生必须增加教室等设施，同时需要雇用新教师。另外，从"若当校招收生六十名并提供寄宿，分成两班教学"的说明来看，三高对招生人数以及生活、教学（"分班教学"）问

题均做安排，计划可谓周详。不过，由于当时的三高留学生仅有 5 人，这个多达 60 名的留学生招收计划，稍显突然。该方案可能是文部省在评估留学生招生规模的基础上，事先提示三高后，由三高提出相应对策的[20]。

实际上，1906 年三高又有 9 人入学，超过了之前的招生总数，使其在读留学生人数增加至 14 人之多。但是在这之后，无论中国公使或文部省提出何种新的要求，三高均以"因本国学生志愿者众，本校各专业均人满为患，故无继续扩大招收外国学生之余地"为由，不予接纳[21]。为此，文部省于 1908 年 3 月 20 日发出了题为"外国人报考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各校对"中学毕业且具有其他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入学资格"的外国人，"根据考试结果给予入学许可"[22]。

但该通知同时又指出，"若因报考者增加，直接影响到本国学生的招生时，则另当别论"。换言之，外国留学生的录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与日本学生同等的学历，二是不影响日本学生招生。虽说此举开启了外国人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但事实上，要做到与日本人拥有同等学力，并非易事。因此，文部省的留学生招收政策不可谓积极主动。至少在三高，未曾出现据此通知入学的留学生。

那么，当时中国留学生接受教育的学习内容、考查方式等具体情况如何呢？从 1908 年 3 月三高上呈给文部省的报告书中，可对三高留学生的教育方针加以解读：

> 从来当校在学之清国留学生，除国语及汉文两科依本人申请得以缺课（免修—笔者）外，其他学科均按［本校］规定履修，考试亦与本邦学生同样［进行］，虽打分时不无稍加斟酌，但大体并无大异。据上学年末之统计，［留学生］十二人中有七人落第，一人被劝退学（学业不进步之故）。虽说如此，［本校留学生之教育］将来亦循同一方针。特此回答。[23]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国语及汉文"之外，其余均与日本学生相同。其次，考查方式方面，学校在打分环节上会"适量斟酌"，但原则上与日本学生共用同一份试卷。最后，校方还表明了此方针今后仍将继续的态度。仅从当时"十二人中有七人落第"的考试结果来看，留学生的学业情况可谓十分艰难。但其中也不乏成绩出色的留学生，例如三高最初的毕业生严恩棫，第一年在 81 名学生中排名第 5，第二年在 75 人中位列第 19。其学力也因此得到校方认可，并被文部省认定为"与本邦人履修同样课程，其学力略等同"[24]。此后，严恩棫 1906 年从三高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采矿冶金学，并于 1910 年 7 月毕业回国[25]。

综上所述，日本最初的中国留学生教育，率先推动于外交部门，由教育部门配合实施。文部省虽然为此专门制定留学生招收法规，但其招收计划仅停留在调查层面，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施措施。而负责实施的各教育机构，由于受教育规模限制等原因，并未显示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积极态度。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日方提出的"六十人分班上课"计划。这种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分班、集中授课"的上课方式，为今后双方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二、"五校特约"协议下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留日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如此困难，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多数学生接受"速成"、"初等"教育的必然性。加之 1903 年以后，某些留学生热心参加政治运动（拒俄运动）的消息传到国内，招来了中国国内对留学日本的批评。清政府于是在 1905 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出国留学资格限制在中学毕业以上以及停止派遣速成学生等等，以加强对留日学生的管理工作[26]。

同时，为了提高留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驻日公使杨枢与留学生副监督王克敏从 1906 年末开始，经过与外务省、文部省多次交涉，最终于 1907 年由新任公使李家驹与日本政府正式签订了"五校特约"协议。其要点如下：

①从 1908 年始，以 15 年为限（至 1922

年），日本“五校”每年共招收中国留学生165人。为此，清政府支付日方培养费。

②中方按照大省、小省分配各省学生名额，经费由各省分担。

③入学考试由各校分别实施，学生入学后每年缴纳650日元（包括学费和培养费）㉗。

这里的“五校”，除前文提到的一高（每年65人，毕业后入帝国大学）外，还包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每年25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每年40人）、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每年25人）、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每年10人），涵盖了当时在各专业领域较有影响的高等专业学校。尤其是位于东京的一高，其前身即为东京大学预备校，在当时的五所高等学校（二高仙台、三高京都、四高金泽、五高熊本）中享有独特的地位。按照当时学制，五校中毕业后得以升入最高学府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及京都帝国大学）的唯有一高，因此受到清政府的格外关注。本文有关“五校特约”的探讨，也主要围绕一高展开。

根据协议，中国留学生需要缴纳的各项费用，除去学费之外，还需额外向各校支付所谓“培养费”。这笔每人每年200日元的“培养费”，相当于日本学生学费的四到七倍。应该说，除学费外，另向留学生收取“培养费”这一做法，在世界留学史上绝无仅有㉘。据中国方面推算，如果协议得以顺利实施，算上一高毕业后进入帝国大学学习的费用在内，总共2475人的培养费用总额大约为775万日元㉙。清政府对该协议所寄予的期望之大可想而知。同时，这个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部省的留学生招收计划，并非仅仅出于教育目的。

既往的“五校特约”研究，对其成立背景等已经剖析得比较透彻。但是对于双方的谈判细节以及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则至今尚有不明之处。例如，协议签订后一高很快于1908年4月开设留学生“预科”，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做准备㉚。这意味着中国留学生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前，需要另外花费一年时间接受预备教育。自此，一高对依据《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所提出的入学请求，均以“教场设备的状况”为由加以拒绝。因此，在一高的留学生教育史上，“五校特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需要留意的是，“五校特约”规定留学生进入一高本科学习，但并未明确是否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接受所谓“预科”教育。考虑到语言及双方学制、学习程度的差异等问题，校方提出如此要求似乎也不无道理。但是，在“预科”结业后的去向、“本科”的授课方式、毕业后升入帝国大学等细节问题的处理上，中日双方意见激烈对立。

首先，关于“预科”结业后的去向问题。就此，一高的官方记录中写到“本校特设预科毕业后，根据本人志愿及报考学校可接收人数等因素，将其分配至本校及其他高等学校本科一年级学习”㉛。意即留学生预科结业后，并非全部升入一高本科学习；且这种分配方式（除了考虑报考学校可接收人数这一客观因素外），也是基于留学生自身的主观愿望。

迄今为止的既往研究中，关于“分配制”原则的论述均沿袭此说。但是笔者通过解读最新掌握的中方文献，发现中方的立场与一高的官方记录截然不同。当时，负责协议磋商的中方代表杨枢，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1907年7月29日）向学部递交了《游学计划书》，文中明确表示一高的教育仅在一高一校实施。也就是说，中方的愿望为预科结业后全体进入一高接受本科教育。

其次，在预科结业升入“本科”后的授课方式上，中日双方亦针锋相对。一高暗示让留学生升入本科后，另外专门为留学生配备教室、教师，与日本人分开学习，即所谓“分班上课”。对于这一安排，中方表示强烈反对。对此一高方面解释说，既然留学生是以将来升入帝国大学为最终目的，“分班上课”岂不效果更好，因为这样可以专门为留学生提供三年的升学预备教育。对此中方反驳道，留学的目的正是期冀与日本学生“同堂听课及同室实验”，如果“分班”则与在国内请外教上课并无大异，何必费此巨款特意求学呢！㉜

对于中方的立场，文部次官泽柳政太郎表示理解，但遭到了以“事权颇大”的一高校长新渡户稻造为首的教授们的强烈反对。但中方不为所动，于1908年7月表示为此不惜撕毁协议㉝。日方最终让步，文部省于1909年3

月召集各高等学校校长商量对策。商议后日方向中方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表示接受中方强烈要求的“同班上课”原则。但同时又指出，预科结业后全部进入一高实有困难，提议将部分学生“分配”到一高以外的其他高等学校，为升入帝国大学做准备。

这便是一高官方记录中所言“分配制”的由来。从双方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分配各校”案，虽为日方提出的妥协折衷方案，但对中方来说“本非遣派原议、亦非学生始愿”，与中方派遣原则及学生愿望相差甚远。

如是，“五校特约”刚刚实施，双方就在预科结业后如何进入何所高等学校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其后在如何进入何种帝国大学问题上，日方亦表现得吞吞吐吐。杨枢在《游学计划书》的相关说明中，指出中方要求日方明确一高毕业后分配到帝国大学的具体人数。对此日方没有速答，仅同意待筹建中的东北和九州帝国大学建成（1911 年）后，再行商定[34]。为此，清朝学部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8 年 12 月 17 日）电告驻日公使，提出了中国留学生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帝国大学的三点意见，并指示公使与日方交涉后，以正式公文的形式写进协议。此三点意见大意如下:

一、毕业之后应准入东京大学。

二、六十五人中习理、工、农、医四科者须过三分之二。

三、入大学时按在高等［学校］时所专习之科分别编入［东京大学对应专业］。[35]

从上述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对一高毕业后升读大学及专业选择的鲜明立场，即要求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重视理工科研究以及注重学习的系统性等等。中方派遣留日意在接受高等、专业教育的目的跃然纸上。不过，中方的这一诉求是否得到满足，目前仍不得而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东京帝国大学（如史尚宽）在对待接收中国留学生方面态度暧昧，而京都帝国大学（如郑伯奇、李亚农等）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姿态[36]。另外，稍后建校的东北及九州帝国大学也接受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如苏步青、郭沫若等。因此，中方要求的准入东京帝国大学一项并未完全得到落实。

无论如何，根据“五校特约”协议，中国留学生得以进入一高预科、分配至一高及其他高等学校，毕业后得以顺利升入帝国大学。中方派遣留日学生接受日本精英高等教育的目标，可谓初步达到。表 1 为 1909 年到 1923 年，“五校特约”协议下一高预科结业后分配

表 1　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结业后分配到各高等学校人数（1909—1923）

年度	一高	二高	三高	四高	五高	六高	七高	八高	札幌	松山	不明	合计
1909	6	6	4	6	5	5	5	5	2			44
1910	8	8	5	5	4	5	4	5	2			46（47）
1911	6	7	7	6	6	5	5	5				47
1912	2	2	2	2	2	1	1	1				13
1913	4	2	3	1	3	2	3	2			2	22
1914	5	4	5	4	4	4	4	4				34（35）
1915	7	5	7	6	6	6	5	6				48
1916	8	7	8	1	6	5	6	6				47（50）
1917	5	4	4	5	5	4	5	5				37（41）
1918	7	4	7	4	6	5	5	6				44（45）
1919	6	5	6	3	4	6	5	5		3		43（48）
1920	4	6	9	2	2	11	5	5		2	2	48（53）
1921	8	4	5	3	6	7	6	9			1	49（50）
1922	7	3	3	0	10	5	4	6		4	1	43（50）
1923	5	5	5	0	5	12	3	9				44（50）
合计	88	72	80	48	74	83	66	79	4	9	6	609（643）

注：根据《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兴亚院政务部编、1940 年）等文献制成。由于 1932 年前东北诸省留学生未被收录在内，分配学校的人数记录也存在印刷错误，因此，笔者根据京都大学档案馆藏《第三高等学校关系资料》，对分配至三高的人数做了修订。此外，表中“合计”栏中的人数比括号内《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卷末统计人数少，笔者估计所缺部分即为分配到三高以外高等学校的东北诸省留学生数。另外，“札幌”是“札幌农科大学预科”，松山是“松山高等学校”的略称。

到各高等学校的留学生人数。

上表显示，一高每年分配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即使在最多的时候也未曾达到“五校特约”规定的65人。究其原因，除了日方的消极应对之外，也有少数留学生因学力、疾病等原因中断学业。1923年协议终止以前，每年分配至各高等学校的留学生人数，虽不能做到完全相同，但其差异亦不甚明显。唯独1912年人数较往年剧减，乃是由于辛亥革命引发的国内混乱造成留学生大量回国所致。值得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国内情势剧变，“五校特约”并没有因此中断，协议签署后的15年间，不断有中国学生赴日留学。

综上所述，“五校特约”下的第一批留学生赴日后，双方仍然因为对条文解释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并几乎导致协议破裂。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首先在于“五校特约”条款中，对于教学、升学等细节并未明文规定。但是究其深层原因，乃是由于双方，尤其是文部省直属的高等教育机构，对留学生的教育意图从一开始就各怀所思。最终双方虽就“分配制”达成妥协，但是在就读大学的具体事项方面依然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这也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

三、“五校特约”协议后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五校特约”虽于1923年结束，但随后外务省实施的“对中文化事业”中也包含留学项目，故留学生教育并未停止。所谓“对中文化事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为了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而抛出的所谓“对华亲善”举措之一。由于美国率先提出归还部分辛丑条约赔款，专门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研究事业。日本意欲效仿，1919年以后中日两国政府围绕庚款的所谓退还尤其是使用途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原则上同意日方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文化事业之计划，但是坚决反对日方一意孤行地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完全交由日本国会的做法。对此，留学生也以“中华留日各校同窗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表明了反对立场[37]。尤其是针对退款的管理使用问题，留学生强烈建议将处置权完全交由中国，以达到真正的“亲善目的”。若不得实现，至少也要做到与美国同样，成立由双方委员参加的“两国委员会”商讨此事。

但是，日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在没有充分听取中方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于1923年3月30日通过了以退款为财源的“对中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部分款项可用于补给留学生学费。与此同时，面向留学生的预科教育事业亦列入预算，将接收留学生的学校由此前的“五校”扩大到“七校”，并对各校每年给予2000日元补助[38]。“五校特约”以来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可因此获得额外“培养费”的“惯例”得到了维持。尽管“培养费”的支付主体，表面上从之前的中国政府，变为日本国会。

如是，1923年以后在日方“对中文化事业”的主导下，中国留学生继续进入一高预科、分配至一高及其他高等学校学习。留学生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道路依旧畅通。下表2为1924年到1932年，“对中文化事业”项目下一高预科结业后分配到各高等学校的留学生人数。

不难看出，表中的留学生数，与之前“五校特约”实施期间相比，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首先是预科结业人数在1924年后锐减，分配给各高等学校的名额也由1923年之前的平均每年40余人，大幅减少为13人左右，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说明“五校特约”结束后留下的空缺，并不能由“对中文化事业”项目完全弥补。其次，分配人数上各所高等学校的校际差异逐渐明显。分配到四高、五高、七高的留学生总共只有几人，而一高、三高、八高这几所学校却接收了大多数的留学生。

如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的留学生逐渐减少，尤其是三十年代以后“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的相继发生，致使众多留学生退学归国。1932年6月“特设高等科”在一高设立，由此中国留学生教育便集中到一高进行。此后，包括三高在内的各高等学校留学生人数剧减。而到了1937年以

表 2 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结业后分配到各高等学校人数（1924—1932）

年度	一高	二高	三高	四高	五高	六高	七高	八高	札幌	松山	不明	合計
1924	2	1	1	0	4	8	1	3				20（24）
1925	3	1	1	0	0	4	0	3				12（13）
1926	3	0	3	0	0	1	0	4				11（13）
1927	0	1	4	0	0	1	0	2				8（15）
1928	4	0	3	0	0	0	0	2				9（13）
1929	3	2	4	2	1	0	1	3				16（23）
1930	2	2	3	0	0	0	1	0				8（16）
1931	4	1	7	1	0	0	1	3				17（27）
1932	6	3	4	0	0	0	0	5			1	19（23）
合計	27	11	30	3	5	14	4	25	0	0	1	120（167）

注：根据《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兴亚院政务部编、1940 年）等文献制成。由于 1932 年前东北诸省留学生未被收录在内，分配学校的人数记录也存在印刷错误。因此，笔者根据京都大学档案馆藏《第三高等学校関係資料》，对分配至三高的人数做了修订。此外，表中“合计”栏中的人数比括号内《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卷末统计人数少，笔者估计所缺部分即为分配到三高以外高等学校的东北诸省留学生数。另外，“札幌”是“札幌农科大学预科”，松山是“松山高等学校”的略称。

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全国的留学生陆续离开日本回国[39]。

结论

本文从接受专业、高等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五校特约”协议前后大学预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及其变化概况。初期的高等学校留学，多源于个人推动或斡旋，因人数较少，留学生常可享受校方提供的学费减免等优待措施。“五校特约”的签订，开创了高等学校留学生教育持续而又稳定的发展局面。但日方要求中方提供“培养费”作为接收条件，在世界留学史上亦属罕见。此后，伴随着两国及世界政治形势的恶化，留学生教育整体上渐趋衰退。

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目的，重点在于接受日本近代国民教育体系中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专业、高等教育。在此层面上，“五校特约”可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实施过程之中，中日双方在教学方式、升学问题上显现出来的矛盾，暗示了中日双方在留学生教育问题上心怀各异。尤其是“同班分班上课”之争，凸显了高等教育机构、文部省、外交部门分别与中方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 1932 年一高特设高等科的设置，意味着“分班上课”的最终定型，也暗示了日方在留日教育问题上最终占得主动。从留学生的角度而言，中日双方的博弈结果也将最终对日方通过接收留学生达到“对华亲善”目的之成效产生直接影响。

为了进一步阐明清末以后帝国大学、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意义，以下几个课题尚需进一步考证。其一，1932 年一高特设高等科设置后，“大学预科”的留学生教育相比清末时期如何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二，据《第一高等学校同窗生名簿》（1995 年版）初步统计，从一高特设高等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共计 429 人，其中不少人升入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因此，留学生在帝国大学就读期间的生活、学习、毕业去向等问题，亦需要进一步探讨。最后，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在文学、经济、文化交流等各领域充当了何种角色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均有待查证。

不容置疑的是，帝国大学、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史，是构建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文化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从清末以后留日学生的角度考察近现代国家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在化解全球化浪潮下出现的各种多元文化交流问题时，都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历史素材。

＊本研究获日本住友财团、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奖励费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帝国大学中国留日学生的二十世纪”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特别感谢 2008 年 9 月日本教育史学会（青山学院大学）期间与会学者的批判与建议。

①这段时期的留学研究，包括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翻印工作，可谓成果丰硕。有关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概要，参见蔭山雅博《解題Ⅲ 明治日本の中国人留学生教育——その諸相——》（近代亚洲教育史研究会（代表 阿部洋）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編—明治後期教育雑誌所収 中国・韓国・台湾関係記事—第二部　中国の部》附卷Ⅱ，龙溪书舍，2002 年）。

②据李喜所推算，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留日学生人数超过两万，而同期的留美、留欧学生分别为万名及五千（李喜所，“孙中山、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暨第二届中国留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 年 8 月，13 页）。

③明治专门学校（大隈重信于 1882 年开办，1920 年改称“早稻田大学”）和法律学校（1889 年合并，1920 年改称“法政大学”）属于私立的高等专门学校，但分别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及“速成科”，专门招收中国学生。

④初期日本留学政策与外交、教育部门的关系，参见黄福庆《清末における留日学生派遣政策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史学杂志》第 81 卷第 7 号，1972 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演变过程，参见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评（1898—19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 年卷）。

⑤例如，折田悦郎和永田英明分别收集了九州帝国大学以及东北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基础文献，阐明了郭沫若、鲁迅、苏步青等人的留学背景、学习内容等详情，可谓成果丰硕（折田悦郎《九州帝国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研究报告）2004 年。永田英明《戦前期東北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受入の展開——中国人学生を中心に——》，《东北大学史料馆纪要》创刊号，2006 年）。

⑥其中东京帝国大学曾于 1942 年进行过有关留学生教育的相关调查。当时的资料介绍参见所泽润《外国人留学生取扱ニ関スル調査委員会（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东京帝国大学）の記録》（《東京大学史紀要》第 9 号，1991 年，第 96 页）。

⑦近代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始于 1883 年来自朝鲜半岛的官派留学生。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中国和朝鲜成为赴日留学的主要来源国。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日本也接收了少量来自东南亚及南洋岛屿占领区（“南方特别留学生制度”）以及“轴心国”德国的“国策”留学生。

⑧“清国人銭承鋕以下六名入学ノ件”《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外国人教師外国人入学》（东京大学驹场博物馆藏）。原日文，笔者译（下同）。

⑨同上“清国人銭承鋕以下六名入学ノ件”。

⑩“文部省ヨリ外国人入学者ノ国籍氏名等取調方ノ件”《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外国人教師外国人入学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驹场博物馆藏）。

⑪同上“文部省ヨリ外国人入学者ノ国籍氏名等取調方ノ件”。

⑫有关一高寄宿制的实施原则和过程，参见寺崎昌男《自治寮制度成立史論——とくに木下広次とその二演説をめぐって——》（《旧制高等学校史研究》第 15 号、1978 年）。

⑬《第一高等学校自治寮六十年史》，一高同窗会，1994 年，第 107 页。

⑭同前“文部省ヨリ外国人入学者ノ国籍氏名等取調方ノ件”。

⑮《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为指导近代日本国立学校招收外国学生的唯一法令。其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入学勿需遵照“一般学则规定”，但需政府或驻外公馆等外交机构的介绍并提供学力证明，接收人数受学校规模、设备限制等等。可以看出，《规程》对入学资格以及结业证书，其内容规定比较模糊。以致后来留学生高等学校毕业后，围绕帝国大学升学这一重大问题引发了各类棘手的难题。此乃远因。

⑯第三高等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69 年开设的舍密局，之后经历了 12 次校名更改后，根据 1894 年的《高等学校令》正式纳入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直至 1950 年废校。在此期间，作为西部日本的帝国大学预备教育机构，在日本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严平《三高の見果てぬ夢——中等・高等教育成立過程と折田彦市——》，思文阁出版，2008 年）。从 1907 年至 1950 年，从三高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超过 130 人。

⑰见文部省专门学务长松井直吉 1903 年 6 月 26 日致折田彦市校长的书面通牒（“清国留学生入学出願ノ際取扱方”《明治三十六年专门学务局往复文书》（1-3239，030063-10）。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藏《第三高等学校関係資料》，资料编号“三高-1-3239”，030063-10。资料编号中，“三高-1-3239”（以下省略为“1-3239”）是卷宗最新编号，“030063”是同卷宗最初整理时所附编号，“10”为卷宗内所含资料名的编号）。折田彦市（1849—1920），萨摩藩（今鹿儿岛

县）生人，1872—1876 年在美国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成为该校第一位来自东亚的毕业生。回国后在文部省及体操传习所任职后，长期担任三高及其前身校的校长直至退休。

⑱“外国学生収容ニ関シテ通牒ノ件”《明治三十八年文部大臣官房往復書類》（1-3400，050002-26）。

⑲同上“外国学生収容ニ関シテ通牒ノ件”（1-3400，050002-28）。

⑳另外，60 人这个数字从何而来，目前尚不得知。而 1904 年当时，一高已招收 31 人，或许是文部省应中方增加名额的要求，将可接受留学生的名额增加一倍后得出。

㉑“文部次官本年収容スベキ清国留学生ニ関スル件”《明治四十一年文部大臣官房往復書類》（1-3679，080002-8）。

㉒同上“文部次官外国人ノ高等学校ニ入学ニ関スル件”（1-3679，080002-13）。

㉓“清国留学生入学試験制度ニ関スル上申並ニ当校従来取扱方問合”《明治四十一年专门学务局往復書類》（1-3710，080033-3）。

㉔“清国留学生厳恩棫学力ニ関シ普通学務局ヨリ照会ノ件”《明治四十一年文部大臣官房往復書類》（1-3620，070003-17）。

㉕随后，严恩棫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登用试验”。这次考试共有在欧美以及日本留学的归国人员 721 人参加，预备考试有 560 人合格。之后又举行了学部考试和在宫廷中举行的“廷试”，其中得分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严恩棫在总共 62 人“最优等”中，获得了 96 分的最高分（“具奏考试游学毕业生监临事竣命令折”，台湾“国史馆”藏清末学部资料《考试游学毕业生案》所收。资料号 169，033-留五）。1911 年后，他参与了武汉和云南钢铁工场的建设等，成为现代中国钢铁冶金业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冶金史料》，中国冶金史料编辑部，1986 年）。

㉖同一时期，日本文部省也于 1905 年 11 月颁布省令第 19 号，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要求中国学生需持本国公馆介绍信方可报考日本学校。该规则遭到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甚至因此愤激投海。该事件的相关报道，不仅频见于中日媒体，在欧美国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参见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格—清末留日学生动向—”，《信州大学纪要》第 2 集，1952 年）。

㉗台湾“国史馆”藏清末学部资料《使日杨公使游学计划书》（资料号 169，038 留五 5）。

㉘这一做法后来在日本的帝国议会亦遭非议，留学生从 1920 年开始免于缴纳除学费以外的各种费用。而当时离“五校特约”协议到期仅剩两年。

㉙关于各年招生人数及经费详情，参见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 年）。

㉚第一高等学校编《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1939 年，第 506 页。

㉛同上《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第 508 页。

㉜同前《使日杨公使游学计划书》。

㉝“电复驻日钦使一高不允中国生合班只得解散前约至已入预科各生毕业后咨送回国或送入高工等校由”，台湾“国史馆”藏清末学部资料《留日各高等学校事项案》所收。资料号 169，038-3 留五 5）。

㉞同前《使日杨公使游学计划书》。

㉟“电驻日钦使分配各校须将三事约定由”，同上《使日杨公使游学计划书》所收。

㊱有关中国留学生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帝国大学的状况与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㊲“庚子賠償の管理使用に対する中華留日各校同窓会の宣言”《大正十二年諸向往復書類第三高等学校》（230018-19）。

㊳“对中文化事业”的成立、展开过程以及各项事业的具体实施情况，参见阿部洋《“对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汲古书院，2004 年。

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来自“伪满洲国”及沦陷区的中国留学生，构成了战争时期留日学生的主体。近年，针对沦陷区教育情况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由于资料缺失等客观原因，帝国大学及高等学校的留学生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